

遏制派眼睛盯住的只是个别的和局部的利益，而不顾及美国的整体利益；  
不抛弃冷战的思维定式，中美关系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善。

# 麦卡锡主义的幽灵 及其危险

□ 阎学通

## 一个幽灵

自今年3月，美国新闻界制造了所谓“政治捐款案”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了类似5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式的反华思潮。这一股新麦卡锡主义思潮被《纽约时报》记者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反华潮流”。新麦卡锡主义对中国的一切都看不顺眼，指手画脚地进行批判，诸如知识产权政策、关税政策、粮食进口政策、能源进口政策、国防政策、军售政策、军转民政政策、安全合作政策、爱国主义政策、新闻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刑事犯罪政策、移民政策、民族统一政策、香港政策、台湾政策、西藏政策、海洋权益政策、边界政策……凡此种种，几乎中国所有的政策都被说成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制造“中国威胁论”最有代表性的是1997年春季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

这次新麦卡锡主义来势如此凶猛，以致美对华友好人士或是客观分析中美关系的人士几乎人人自危。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基辛格博士，成为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他被说成是“中国人的买办”。连克林顿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佩里也难逃批判，刚卸任就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原因是有人状告他通过与中国进行军转民的合作项目，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作战能力。美国《新闻周刊》指责说，美国在90年代放松对中国技术出口的主要责任在佩里，因为他允许向中国出口许多种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而无需许可证。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更是不得不小心谨慎，稍有不慎就会被戴上“为中国辩护”的帽子……近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又要求司法部调查，是否“政治捐款”导致克林顿政府的官员允许向中国出口机密技术。

## 两个声音

但是，终归时代不一样了。这股新的麦卡锡主义思潮很难再大行其道。人们还是听得到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出发的辩论声音。辩论的核心是对华采取接触

政策还是遏制政策。坚持接触政策的人多是行政官员、军方人士、知名学者、工商界代表，而建议采取遏制政策的则多是新闻记者、国会议员、在野政客、社会活动分子等。华盛顿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劳伦斯·卡普兰对这股反华势力的政治成分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冷战后最为混杂的一个联盟，“包括了强硬的反共分子、经济民族主义者、宗教保守派、工会活动分子、竞选改革鼓吹者，以及人权分子”。由于两种势力的人员构成不同，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形成两个主流。由于接触派掌握了行政、国防、经济和教育的实权，因此美官方对华政策的主流派是坚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接触。相反，遏制派控制了新闻、工会、教会及其他社会团体，因此美国社会舆论的主流派是与美国对抗，希望尽快扼杀中国的崛起，以防后患。

出现两个声音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利益不同。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执政者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较强，因此，他们的对华政策较多地考虑美国整体国家利益。如改善中美关系有利于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有利于美国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和出口市场，有利于美国在裁军军控、环境保护、反恐怖主义、打击国际犯罪等国际重大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在以上诸多方面能否取得政绩，关系到政府主要官员们的个人声誉。工商界代表考虑的是企业的利润，在他们看来，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既意味着利润下降、通胀上升和解雇人员，中美关系恶化还意味着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在军人眼中，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可以避免中美发生不必要的军事冲突，保持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的职业责任关系着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保持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和不断改善，才能使专家学者们所研究的中国问题变得有意义。

相反，遏制派人士的个人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一致。新闻记者只有报道坏消息才能出名。西方记者的名言是“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一

名西方记者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在华工作的目的就是争取被中国驱逐出境，这样才能出名。制造中美矛盾，才能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国会议员只有反对政府政策，才能表现出他们的“政治胆略”和增加个人政治资本。人权分子只有攻击中国，对政府施加压力，才能提高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工会活动分子和经济民族主义者则只关心自己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利益，而不看美国从中美经济往来中获得的整体利益。这些人虽然各自的利益不同，但从制造反华舆论中都可获益，因此结成了一个混杂的联盟。

### 三个危险

美国是个意识形态非常强烈的国家，美国人从冷战的结束中得到了两种不同的经验教训。理智的人，通过冷战结束认识到，意识形态主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危险性，冷战时的战争危险完全是意识形态对立所致。另一些美国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美国靠扩大自己的意识形态赢得了冷战，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应以传播美国民主为对外战略宗旨，以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以意识形态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势力，有可能给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三种危险。

首先，意识形态压力有破坏改善中美关系进程的现实危险。美国《国家利益》主编哈里斯先生发现许多美国人患有“敌人缺乏症”，这是美国的冷战思维定式所致。冷战后，原先的敌手苏联不存在了，于是

硬要“塑造”一个假想敌。一些美国人先是把日本当成对手，后来是伊拉克，现在又转向中国。这种冷战思维方式被遏制派利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反华势力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已从去年中美首脑会谈时提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进程表中退了出来。

其次，意识形态主义者有制造新政治危机的危险。半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国地位使一些美国人有了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心理上难以接受别国的强大。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决定了中国强大将是不可阻挡的，香港回归将加快中国崛起的速度。如果反华势力充分利用美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则可能在香港回归之后制造事端，逼迫美国政府干涉香港事务。这样中美之间将不断发生政治冲突，危机不断。目前，克林顿政府似乎还能与反华势力抗衡，把握自己的对华政策，但克林顿是否能在香港回归后仍保持对华政策的方向还有待观察。

再次，意识形态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有导致新冷战的潜在危险。一些死抱冷战思维方式不放的人适应不了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他们不关心全球化的世界发展，只关心自己身边的利益。美国新当选的众议员中有1/3没出过国，他们不了解国际社会，为附和自己在所在州的舆论，支持狭隘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如果这种思潮与反华势力长期结合，并掌有政府，则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由此导致新冷战发生的危险就会出现。不过，目前这种危险还仅在潜伏之中。▲

## 『香港回归问答』答案(十二)

39.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因而它不能单独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保持和发展外交关系。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国外交部在港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40. 今年7月1日后，凡中国政府进行的同香港直接有关的外交谈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代表均可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参加外交谈判的条件：一是“中央政府进行的”；二是“同香港直接有关的问题”；三是不单独对外谈判，而是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

41.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从原则上讲，台湾在香港的机构及人员是可

以继续留驻的，港台两地可以继续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联系和交往，但不能在港设立官方机构。有一些基本原则必须遵守，如台湾驻港机构不能从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制造国家分裂和破坏祖国统一的活动，不能做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事情；要遵守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法例规定，不做不利于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事。

42.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中国政府有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香港实际的，既有利于香港长期保持稳定繁荣，又有利于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次，中国政府对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各项规定具有坚定的决心和无比的诚意；第三，中国政府一贯诚心诚意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凡是对香港稳定繁荣有利的事务都予以支持；第四，内地和香港同胞都热切期盼“一国两制”成功，希望祖国繁荣富强。完全可以预料，香港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必将更加繁荣稳定，香港的明天将更加美好。